

# 论技术马克思主义

李三虎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75)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讨论技术问题,是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方向。推动技术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把它建构为一种技术哲学传统或方法。虽然当代西方技术哲学把马克思视为第一代技术哲学家,但实际上各种学派或观点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万花筒式的思想定位。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对技术问题的哲学反思不外乎技术作用的确定性和技术的社会关系这两条路线。经典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条路线上接近于在长期历史中强调技术的优先性,在第二条路线上对技术资本主义给予批判并展望技术积累对共产主义的历史意义。在当代西方技术哲学语境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把这两条路线分别展示为分析的技术哲学和批判的技术哲学,倾向于一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技术政治哲学话语建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将这两种路线统一起来,进行一种技术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建构:以技术作用的确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设置现代化议题,以技术的社会关系为实现这种现代化议题提供推动力,以便逐步走向一种自治的技术社会主义。

**关键词:**技术哲学;技术马克思主义;技术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4)01-0030-12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4.01.004

## On Tech-Marxism

Li Sanhu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Guangzhou Committee of CPC,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75, China)

**Abstract:** Discussing technology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direction in technology philosophy. To promote Marxist study of technology, it is essential to construct it as a philosophical paradigm of technology. Marx is viewed by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echnology philosophers, but the west with various schools or viewpoints actually provides a kaleidoscopic thought for classical Marxism.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echnology issues can be divided into both the certainty of technology functioning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of technology. For classical Marxism, the priority of technology in a long period of history was emphasized on the former line, and the tech-capitalism was criticized an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for communism revealed on the latter line. For western Marxist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se two lines are presented respectively as analytical and critical philosophies of technology, towards a construction of tech-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is intrinsic to capitalism. Unlike this, Chinese Marxism in a new era is practically and

收稿日期:2023-06-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VRC030)

作者简介:李三虎(1964—),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技术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伦理研究。

theoretically being constructed by uniting these two routes in the real socialism, that is, to set modernization agenda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ertainty of technology functioning, and to provide driving forces for achieving such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echnology, so as to gradually move towards an autonomous tech-socialism.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ech-Marxism(Technological Marxism); Tech-Socialism(Technological Marxism)

##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技术哲学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发展出各种派别。除了有分析的技术哲学和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现象学技术哲学和解释学技术哲学等流派之分外,还有德国的技术哲学、美国的技术哲学、法国的技术哲学、荷兰的技术哲学、西班牙的技术哲学等国别之分。《中国的技术哲学——经典文献和当代成果》(2020,斯普林格出版社)一书,以“中国的技术哲学”为名展示全球技术哲学地图中的“中国版图”。这本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版技术哲学文集,向国际学术界传递了“中国声音”“中国话语”。该书主编王前在导论中指出,“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还需要深化和更加系统化,期望发展成为更为综合、更具特色的理论体系。”<sup>[1]</sup>这意味着在方法论上综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激发,反映中国技术进展的速度,突显技术哲学的中国话语特色建构,其意义不言自明。倡导一种“技术马克思主义”(techno-Marxism)叙事,也许是一种较好的学术路径选择。

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一度被认为是过时的,它的历史意义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受到削弱。但是,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方面理解技术的经典叙事,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中国,都曾发挥过持续的思想影响,且这种影响永远存在。特别是当前的中国,在技术方面已经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阶段。中国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遏制的国际关系现实,使技术问题不仅是一般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国

际)政治问题。为技术哲学提供一种马克思主义视角,有助于加深对技术和技术知识广泛而深刻的理解,也能为厘清技术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政治哲学思考。

什么是“技术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一种技术哲学传统或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强调“解释世界、改造世界”方面来说,技术马克思主义就是把改造世界的技术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解释或反思,并着眼解决技术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并对技术发展的价值取向作出预想。目前,国内学者围绕“马克思的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及“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思想)”等主题,已经有了相应的研究成果,但大多数研究都仅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引述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评论,中国化的语境或现实的社会主义语境缺失是显而易见的。本文强调,技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综合的技术哲学方法。首先,从评论当代西方技术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证定位出发,进入经典马克思主义技术叙事特征化;其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作出评述;最后,就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技术论述给予总体概括,意在突出技术哲学的中国话语特色建构。

## 二、当代西方技术哲学审视

显然,当代技术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的技术转向”结果,基本上是西方语境的。对于西方技术哲学,我们可以笼统地将它区分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两大学派。唐·伊德将西方技术哲学研究分为杜威学派、埃吕尔学派、海德格尔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就是这样一种分类法<sup>[2]</sup>。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虽然存在各种传统,不同学者或流派使用的研究方法各

异,但从理论导向来看,主要可以分为技术工具论、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在经典引证方面,基本上也是从这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以定位的。

### (一)技术工具论定位

工具论由来已久,甚至在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之前就已经存在。目前,技术工具论已经成为现代政府和政策科学层面的常识化主流观点表达。工具论强调,技术是中立或中性的,即主张技术只是服务外在用户的纯粹工具或手段。实际上,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中立论—价值论之争,但这并未影响人们对工具论的哲学发挥。荷兰学派以“人工物”代替工具概念,提出“技术人工物的双元属性(结构—功能)”研究纲领,丰富了分析的技术哲学研究;美国实用主义学者极大地发挥了有用性的工具概念,把工具论与实用主义等同起来,强调万物皆工具,由此,强化了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研究。无论如何,人们总是将工具论追溯到首次使用“技术哲学”概念的恩斯特·卡普那里。卡普提出的“器官投影论”,被认为是技术工具论的早期明确表述。有趣的是,马克思与卡普都是19世纪的德国人,同属左翼黑格尔派。西方哲学到了黑格尔这里,已经把现代世界的全部本质归结为“主体性自由”——作为主体的人要求对一切客体的自由控制。笛卡尔提出“身体即机器”,拉美特利认为“人即机器”,黑格尔则说明机器是人类身体这个“出自上帝之手的机器”的外化手段。从同属左翼黑格尔派人物来说,马克思的“器官延长论”与卡普的“器官投影论”如出一辙。厄尔马克·埃尔图纳认为,“马克思把人设想为‘制造工具的动物’,是说人作为一种物种通过作用于自然创造世界,并使世界成为人的延伸的无机身体……尽管人的生存展示自身的方式是人利用技术的特定历史结果,但在本体论上,马克思把对象化和外化作为对人定义的特征。”<sup>[3]</sup>但是,“器官延长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论述技术问题的核心内容,这与卡普以

“器官投影论”为其核心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刘则渊指出,“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关于技术本质上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这一思想,视为器官延长论的本质和核心。因为正是人创造和借助满足社会需要、适合自身肢体的技术手段,来引起、控制和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sup>[4]</sup>这种看法,在工具论意义上强调人是可以控制技术的,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展示为一种技术乐观主义。

### (二)技术决定论定位

技术决定论,主要强调技术变化是社会(历史)变迁的首要原则。布鲁斯·宾伯认为,技术决定论包括“规范性叙事”“逻辑性叙事”“无意识后果叙事”三种解释方法<sup>[5]</sup>。其中,无意识后果叙事强调技术行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不可控制的,即使自觉奉行德性规则的社会行动者也无法预料技术发展的影响。这种方法在马克思那里无法找到相应的思想线索。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解释而言,主要是诉诸规范性叙事和逻辑性叙事两种方法。逻辑性叙事方法的解释是依赖历史规律和自然法则说明未来只有一种可能,主张固定的技术发展顺序规定了社会进化路线。罗伯特·海布伦纳以这种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建构为一种技术决定论,他引用“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社会”,逻辑地推出了“蒸汽磨紧随手推磨而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这正是对自然的技术征服的下一阶段,它遵循的是仅此一条前进道路”<sup>[6]</sup>。

与逻辑性叙事方法强调技术的自然顺序独立于文化决定历史变迁不同,规范性叙事依赖效率和生产力规范,主张技术发展以决定论的形式独立于社会发展,从而把技术决定论看作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前者是一种分析的技术哲学叙事,后者是一种现象学技术哲学叙事。在当代西方技术哲学中,规范性叙事成了技术决定论的标准方法。按照这种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定位,可以列出一长串西方非马克思主义



哲学家名单。特别是马丁·海德格尔,把技术分为本质向度的“本体论技术”和非本质向度的“本体技术”。本体论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自主的,并对社会具有决定性作用。由此,海德格尔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一种形而上学规定,就是让“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资料”,而现代劳动的本质是“自己安排自己的无条件生产过程”<sup>[7](P384)</sup>。他在论及“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时也洞察到了“人的异化”问题,认为这个概念虽然来自黑格尔,但只有“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向度中去”<sup>[7](P383)</sup>。海德格尔把马克思主义展示为一种技术悲观主义,这与技术工具论和逻辑叙事方法的技术决定论是不同的。

### (三)社会建构论定位

技术决定论的规范性叙事基本上是在“本体论技术”意义上开展哲学反思的,但在海德格尔之后,当代西方技术哲学开始发生面向“本体技术”思考的“经验转向”。荷兰学派的“技术人工物二元属性”研究纲领、伊德的考察技术在人与世界之间起作用的“后现象学方法”,以及托马斯·平齐、韦博·比克等人的社会建构论,都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方法论。这里的社会建构论不再如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决定论那样寻求技术的本质特征,而是把技术发展看作一个涉及多种异质因素互动的多维社会过程,主张把技术人工物的最终设计看作不同社会群体通过一系列争论和协商形成的社会产物。唐纳德·麦肯齐修改了对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解释,他认为,对马克思而言,当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到来时,是社会关系塑造了技术,而不是相反<sup>[8]</sup>。这虽然是一种社会学观点,但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必然会追问“社会能建构何种技术”的哲学问题。如果麦肯齐认为的那种技术“形塑”在阶级社会是以异化的形式出现的话,那么克服这种异化便需要一种非对称的社会建构。威廉姆·林齐等认为,“马克思特别关注异化的存在,实

际上洞察到了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知识与阶级社会的知识之间的非对称世界。也就是说,无阶级社会的知识将会摆脱阶级社会的知识的异化品质。”<sup>[9]</sup>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建构论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位,既是经验的研究,又有规范分析的意味。

当代西方技术哲学的不同思想流派,总是能够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适合自身并加以发挥的相关论述。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证和定位是分散的,甚至是矛盾的。从不同的思想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既是工具论的,又是决定论的,还是建构论的。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纯粹工具论的,也不是强决定论的,更不是抽象建构论的。这种思想重构是围绕马克思对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批判而展开的,是把技术(如机器引入等)置于资本家—工人、异化—自由、规制—斗争、压制—解放等关系中进行技术哲学理论化。布鲁诺·拉图尔在社会建构论基础上构建其行动者—网络理论时,以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概念隐喻资本家,认为马克思为资本家用人—非人(如机器等)联盟应对工人反抗提供了一种社会技术分析:“他(马克思)把‘君主’——也即资本家——置于阶级斗争中加以看待,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无论何时引入一种机器或机械装置,都可以替换、取代、解雇、侮辱和驯服工人,破解工人的反抗。这一战术性规则再也简单不过:若工人让你感到不安,那就求助于机器制造者;若工人罢工或者任性,那就用机械装置的部件联系取代工人的人为联系。”<sup>[10]</sup>这种看法固然表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观点,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技术辩证法的全部内涵,它还包含技术的解放意义。因此,彼得—保罗·维贝克沿着伊德的后现象学方法发展其技术调节(technological mediation)理论时,强调如果像马克思那样把技术看作是以异化的形式对人性起着压制作用的话,那么反抗或解放就是对技术压制的反题或

扬弃。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种非常精致的辩证法模式,不仅是一种压制与解放的辩证法,而且也指向一种与技术共生的不可避免的斗争”<sup>[11]</sup>。不难看出,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在经验转向中,倾向于在技术政治哲学意义上引用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

### 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延伸

现在,人们一般都接受卡尔·米切姆“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的区分方法<sup>[12](P17)</sup>。“工程的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有恩斯特·卡普、彼得·恩格迈尔、弗里德里希·德绍尔、吉尔伯特·西蒙顿、马里奥·邦格等;“人文的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为雅克·艾吕尔、刘易斯·芒福德、马丁·海德格尔、汉斯·乔纳斯、兰登·温纳、阿尔伯特·博格曼等。前者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物,被认为是第一代技术哲学家;后者多为20世纪中期后的人物,被称为第二代或第三代技术哲学家。目前,一般把马克思归于第一代技术哲学家,但马克思提供的技术哲学见解并不同于“工程的技术哲学”,而是更接近于“人文的技术哲学”。马克思作为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对技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是否将他视为技术哲学家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马克思为技术哲学提供了怎样的见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对物性的重申,表现出一种对人类世界的新的唯物主义关怀。这是导致人们常常求助历史唯物主义论述技术和技术人工物的原因。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技术哲学的理论延伸,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技术的论述至少包括如下三个命题。

#### (一)技术对科学的优先性

在唯物主义意义上,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技术的地位问题。这是有关技术哲学能否成立的基础问题。如果认为技术只是科学的应用的话,那么只要科学哲学就够了。古希腊哲学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柏拉图区分了回

忆(anamnesis)与助忆(hypomnesis),前者是不朽灵魂的记忆,后者是对记忆的人工或技术弥补。在西方哲学中,这种区分实际上强调了不朽的灵魂对技术的优先性,甚至有了“灵魂不朽,技术就变得多余”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一样,区分了知识(epistēmē)与技艺(technē)。但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强调知识是目的,技艺是服务目的的手段,技术与自然包含自身的运动原则不同,本质上是惰性的中立工具,其地位取决于人如何使用它,即要求一种动力因。这就是说,技术只是对人类身体缺陷的弥补,而这个思想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工具论。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对亚里士多德的技艺概念给予了批判,将柏拉图式的理念对技术的优先秩序进行了颠倒。历史唯物主义将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作为阐发历史的基础,认为意识注定只是做着追赶物质条件的游戏而已,物质条件总是会先于意识而变化。如果认为科学是一种人对自然的意识,技术是人对自然的改造的话,那么,对今天的技术哲学来说,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无疑确立了技术对科学的优先性论断。这绝不是说技术具有不可还原性,而是把技术置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使用工具从事生产或劳动的实践中加以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是人与技术之间的最初界面,在这个界面中,人可以发明技术并用其改造自然。马克思曾经引入人的“类存在”概念,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sup>[12](P57)</sup>。人作为“类存在”物代表着人的劳动活动,也就是说人是一种能用技术生产自身的存在或种类。马克思指出,“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sup>[13](P429)</sup>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格言:“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更是表明改造世界优先于解释世界,实践优先于认识,生产方式优先于上层建筑,人工物优先于理论或知

识。如果说这种看法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一个重大进展,那么就可以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技术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基础,不在于亚里士多德中立的工具本身,而在于涉及价值意义的技术性劳动或生产实践。

## (二)技术现象的历史性解释

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唯物主义的,又是历史的。所谓技术的优先性,必然把它置于相应的历史情形中加以思考。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类存在”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形成了满足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的生产手段。人类以一种对社会新陈代谢的集体的有意识的规制形式,不仅生产出了劳动工具,而且还做了协同性安排,通过集体形式构成了社会生产力,此即辩证的技术历史方向。技术调节自然和社会,并成为人类的一种历史力量。马克思强调,在工业革命中,如机器的采用、化学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等,使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还要多、还要大。这种生产力爆发表现了现代技术的巨大力量,但对马克思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技术为何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发挥出巨大的调节作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强调包括技术在内的生产力必然是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从而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是在奴隶社会的生产力遭到破坏之后,通过广泛的征服在更大的地理范围推动新的生产方式兴起而实现的。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是源于社会关系的变化——同一个资本家同时雇佣较多工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才得以兴起。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仅是一个创造使用价值的适合一切时代的一般劳动过程,而且是一个追求资本价值增殖的特殊社会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让劳动隶属于资本的过程,它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期,在既有的前现代技术条件下展开的“形式隶属”——强迫劳动服从资本价值增殖目的,如无

限制地延长劳动时间等;二是18世纪末以后,在新兴工业发展中展开的“实际隶属”,特别是机器系统作为动产的“现代之子”更是成为服务工业资本价值增殖的世界历史力量。正是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关系产生之后,现代工业的历史发展才使技术进入需要通过科学加以分析和改进的现实深度,从而“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sup>[13](P400)</sup>。所以,只有资本把机械发明纳入职业化轨道、把技术发展的生命力与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工业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之后,现代技术才为资本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增殖效应,才具备自主发展的动力并爆发出巨大的社会变革力量。

## (三)技术应用的未来场景预设

对现代技术的历史力量,马克思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即“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sup>[13](P408)</sup>?由此,马克思对机器的构成给出了历史性解释。他认为,现代机器都由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三个部分构成,只有工具机是“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sup>[13](P411)</sup>。这是一种历史界定,它表明工业机器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的本质区别是:手工业者仍然享有使用工具的自由或快乐,机器生产中的工人则完全变得机械化。机器系统把人包含在整体的机械运动中,工人置身其中不仅没有自由,而且面临着巨大威胁,因此,现代工业导致真正的人的异化。这表明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不是减轻人的辛劳,而是按照资本价值增殖逻辑让工人服从机器系统,使工人进入与自然(包括人性)的有效对抗中。这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标志——源于现代技术集体调节的劳动分工导致新的阶级形态(工人阶级)及其争取权益的斗争。所谓阶级不是一种社会结构,而是技术生产出来的社会物质形态——大工业系统的剥削关系。

马克思正是以其劳动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



劳动过程进行了批判,并激发了对无阶级社会技术发展方向设想。这同样是诉诸历史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为了终结这种阶级对抗,马克思参照了一种无阶级社会的原始共同体模式。他在将原始共同体模式与资本主义模式比较之时,注意到现代人使用机器导致人完全受资本支配,而古代人使用工具是为了减轻辛劳——让技术担当人的解放角色。基于此,马克思把技术调节设想为劳动与其物质前提的自由联合,倡导一种向人的初始价值复归的历史方向——社会化的人,以最小的消耗合理地调停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社会控制之下,使其不作为盲目的力量支配人。这种预设表明,人是一种共同体存在,并且人、技术和自然可以在共同体之中和谐共生。

#### 四、技术资本主义批判话语

经典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大规模改造世界的工业革命时代。从上面的论述可知,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技术发展突然爆发出来的历史力量有着深刻的整体理解。但进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围绕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解却存在各种争论。可以将这些争论分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两大派别。前者以技术作用的确定性为前提发展出了分析的技术哲学,其代表为杰拉尔德·阿兰·杰瑞·柯亨、约翰·罗默、乔恩·埃尔斯特和菲利普·冯·巴黎杰斯等;后者以技术随社会关系而变化为线索推动批判的技术哲学发展,其代表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他们往往会追溯卢卡奇为其理论创始者)。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早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它在技术哲学方面更有理论上的弹性,因此更能获得新的发展或理论延伸。

##### (一)分析的技术哲学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将其智力基础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社会科学这样的认识上,

力图利用分析哲学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重建马克思主义。就技术哲学而言,柯亨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主义解释,提供了一种技术决定论的逻辑性叙事。他要表明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功能关系,并从人类理性和物质稀缺等假定出发推演生产力发展的内生趋势,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刺激性矫正、组织生产关系服务生产力发展等<sup>[14](P152-153, 158)</sup>。柯亨认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解释优先性,而这种解释是功能性解释:“说经济结构适合既有的生产力水平,意思是前者为后者的有效用途和发展提供了最大的用武之地,并因此有所获得;说存在决定意识,意思是领先的社会理念至少可以从其习性或品格方面作出解释,然后根据这种品格来支持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结构。”<sup>[14](P278-279)</sup>在这种意义上,柯亨为技术决定论提供了一种逻辑性论证,“机器以及联合的类人力量总是发挥着历史的独立动力功能”<sup>[14](P147)</sup>。这一陈述包含两个标准:首先,它是决定论的。历史决定于规律或物理和生物条件而不是人的意志,这使历史成为决定论的东西,所谓决定论参照的是适合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人类行动规律。其次,技术决定论是真正技术的。技术在先前的世界事件和状态,决定在未来中扮演着必要的角色,自然规律和人类行动规律决定人类历史必须要通过技术实现。前者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命题,后者代表着技术的优先性命题。在柯亨看来,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而言,导向共产主义的最恰当力量或推动历史进步的政治目标,主要不是自我的意识,而是能够对环境起到调节功能的“技术”<sup>[14](P22)</sup>。这样,柯亨按照功能主义解释,认为上层建筑是适应物质生产基础的结果,但他并未说明这种适应的社会政治机制或方向。

##### (二)批判的技术哲学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技术决定论确定了技术的历史意义,也由此论证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但这种“被动适应”并不能较好地回

答今天人们普遍关注的囚徒困境。如,公共产品问题、公地的悲剧、搭便车问题、技术自主权竞争等。为了在行动—理论层面回应这些问题,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沿着技术的社会关系进行一种规范性叙事——从对决定论的技术理性(如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概念)批判出发,倡导社会理性(如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相信技术发展是一种公共行动的文化和政治现象。在西方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马尔库塞是最出色的批评者。他拒绝对“进步”的盲目信仰,认为那种主张技术就是自然知识的纯粹应用的观点是应该受到批判的。为此,他对潜力与价值进行了区分,认为潜力是达到最高最发达形式的目的或价值的增长通道。传统工艺就是要努力实现这种潜力,但潜力一旦不再被认为是可以服务原本的价值时,那么剩下的就是经验上给定的操作了。现代科学技术变得价值中立,甚至使手段本身变为目的,这样技术脱离传统文化束缚而放荡不羁。马尔库塞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在于一种积极的选择——重建技术理性。“社会主义的质的差异,以一种新的社会形式或方式与统治的连续体决裂,不仅是生产力的合理发展而且是竞争性生存斗争的进步重置,不仅是消除贫困和辛劳,而且要把社会和自然环境重建为安宁的美好世界,这些都要求进行总体的价值重估以及对需求和目的的整体改造。”<sup>[15]</sup>当然,在资本主义语境中,马尔库塞不可能如经典马克思主义那样强调一种革命,而只是在理论上表明与柯亨的自然规律要求不同的符合“美学规律”的技术理性选择。

### (三)技术的批判理论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宏观上为打破占据统治地位的技术理性提供了一种社会改造的美学和伦理标准。这一路径随着当代西方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和社会建构论发展,开启了技术政治哲学的大门。马克思在论及技术的社会关系时,的确包含了这样的观点:技术是在占据优势

的经济体系中发展和演化的,对技术发展的合理社会安排也会偏向于优势阶级的权力效应。安德鲁·芬伯格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强调技术是政治的,并在当代西方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中从微观方面发展了一种技术的批判理论。芬伯格将社会建构论方法引入批判理论,独立提出了“技术符码”这一技术政治哲学分析工具。所谓“技术符码”是指,“为社会行动者语言与技术语言或规格之间的意义转译提供的一般规则”,它“决定了技术决策的实际内容”<sup>[16]</sup>。考虑公众参与技术发展,“技术符码”包含如下两个特点:一是“技术符码”全球化,如去技能化已经变成一切技术领域的工作文化;二是转译解释学,如将环保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转换为技术设计规格或品质。这一概念表明,随着技术越来越快速地渗透到整个社会,围绕技术存在的斗争也变得日益普遍。在芬伯格看来,面对新兴技术在政治领域的多样化斗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分析已经显得有所不足,因此“技术的批判理论就是要力图提出伴随着随处可见的技术斗争及其中的权力分配带来的各种问题”<sup>[16]</sup>。围绕环境和医疗问题以及互联网用户创新存在的各种斗争,必然带来重要的文化变迁。从工业主义诞生开始就形成的无可置疑的“技术符码”已经受到各种质疑,大量的技术问题进入公共领域接受审视。因此,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创造历史”,仍然是我们的重要使命。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技术的分析哲学到批判的技术哲学,特别是从批判的技术哲学中延伸出的技术批判理论,这些表明马克思最早推动的权力、资本主义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理论,现在已经使技术不再如工具论者所说的“是政治中立的”,而是越来越指向一种解决社会与技术相互纠缠的技术政治哲学。如前所述,伊德、维贝克等人聚焦技术对人类经验的改造力量,对技术调节、关系本体论开展广泛讨论,也展示了这种趋势。只是他们常常会指责马克思主义方法



论本身带有技术恐惧论色彩,而批判理论家们则认为,技术调节理论并不诉诸技术权力概念关心技术的政治意义。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技术哲学方面的最新进展,为技术调节的权力功能提供了一种自治论的马克思主义见解。这种见解与法兰克福学派聚焦资本积累进行政治经济学哲学解读不同,它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认为一个阶级只有参与斗争并形成抵抗力量时才会走到前台来。从技术调节权力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再是一种对资本和劳动作出选择的斗争形式,经典马克思主义那些不可避免的“总体性”“异化”“扬弃”话语正在被米歇尔·福柯等人所说的“处置”“控制”“生物政治”话语取代。例如,数字技术构成了“虚拟的圆形监狱”,强化了对多数人的监督和控制。这意味着生物权力需要针对资本本身作出调整来进行抵抗,意味着技术系统以阶级斗争为调节对象或以阶级斗争形式为条件。在这种意义上,皮特·莱门斯等人主张,自治论的马克思主义为技术调节提供了一种对抗形式的选择。“通过颠覆生产循环挑战、取代和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主观化的(技术调节)实践……诸如开放的生产来源、批量的规模化生产等技术调节实践,会使设计者/用户、公共/私人等观念重新洗牌,由此改变资本主义的整个面目。”<sup>[17]</sup>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颠覆性革命问题,而是“技术资本主义”(techno-capitalism)内在的权力调整问题。

## 五、技术社会主义话语构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源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批判,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互动中已经变成一种精致的技术批判理论。这种理论指向的并不是如经典马克思主义那样触发拥有高级技术成就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借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话语理解资本主义语境中的技术民主化诉求。进入现实的社会主义语境中,我们会看

到一个事实:经典马克思主义预想的先进工业国的欧美国家并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作为落后农业国的俄国和中国等首先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这一事实,可以启用“技术社会主义”(techno-socialism)概念,用以说明中国现代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技术论述的理论指向。

### (一)技术社会主义是技术的

“技术社会主义是技术的”是一个发展命题。对中国而言,重要的参照是西方发达的技术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曾以历史唯物主义生动地表达19世纪的技术乐观主义,他强调的技术优先性命题意味着共产主义一定是充分展示技术调节力量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为此曾为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等待技术进步(实现脑体差别消失)和社会政治革命(实现所有制社会化)两种相互独立的革命方案<sup>[18]</sup>。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现实并不能坐等技术进步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而是要像俄国那样开展社会政治革命。进一步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既然不是建立在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那就必须要在理论上以科学技术革命的力量和意义展示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提出的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包含了从手工艺到现代机器生产的技术变革逻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提出的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也是以技术变革为前提。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以“发展是硬道理”赋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社会主义本质意义,他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更是极大地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技术优先性命题,强调技术发展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这种论述包含双重含义:一是以技术进步的无限性承诺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标准,意在引导人们对技术发展持有积极态度,无论是激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是制定建成现代化强国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都是为了强化这种态度并付诸行

动;二是以技术变革提升劳动生产率,是表征社会主义文明的决定性标准,当前倡导的“高质量发展”“科教兴国”“科技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科技自立自强”<sup>[19](P23-35)</sup>,这些表达正是执行这个标准的战略部署。

## (二)技术社会主义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的

“技术社会主义是技术的”这个表达为中国发展提供了现代化议程,而“技术社会主义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的”这个表达则是要为实现这一议程提供相应的推动力。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谓现实的社会主义是指必须要将社会主义展示为推动技术进步的整体制度设计,而不是如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仅仅把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技术民主化的一个参照因素。这种制度设计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加速技术进步及其经济社会有效性发展;二是解决技术来源及其推动力。第一个问题表明,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技术基础巩固问题,以强化推动技术发展之于社会主义的紧迫性;第二个问题表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以怎样的方式推动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些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问题,但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答。毫无疑问,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明社会政治革命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联系。如果说苏联的社会主义过渡还未能完成两者的联系就解体了,那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是在实践中摸索并寻求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制度设计,以实现快速的技术创新进步。

毛泽东曾把历史唯物主义表述为一种“双决定论”<sup>[20]</sup>:一方面,生产力、实践和经济基础表现为一般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理论和上层建筑表现为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特别是如果不变更生产关系就不能发展生产力时,变更生产关系就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并不算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复解释,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合中国生产方式。因此,当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时,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尊重中国农业国的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推动技术发展显然经历了一种辩证的历史过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模仿苏联计划模式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但这并未从整体上改变中国落后的技术面貌。因此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识到社会主义过渡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文明规划不能离开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路径依赖,必须要将包括市场机制、技术成果和管理方式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进行社会主义的应用和发挥。与苏联仅仅以所有制社会化来实现技术进步不同,中国逐步采取了一种集公有制占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技术进步为一体的新型举国体制。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实践指向,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表征。马克思曾说,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发明预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火药把骑士炸得粉碎,罗盘针用于航海打开了世界市场,印刷术变成科学复兴或精神发展的手段。虽然,核电、高铁和互联网等技术应用在初级工具化方面都不是中国的原创,但它们一旦融入中国情境并获得次级工具化的巨大推动,便以规模化的发展迅速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核电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非传统动力;高铁的网络化延伸将中国几乎所有城市连接起来并使中国人在城乡之间快速流动;互联网用于商务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便利的流动的市场服务,而且也让中国人改变了传统的孤立的处事态度,进入一种普遍联系的立体思维中。可以说,中国的技术社会主义正是通过取得民族独立、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市场机制运用,实现了社会政治变化与经济技术进步的有机结合,并基于深厚的人文地理优势推动了技术文明的情境化融合和

规模化发展。

### (三)技术社会主义是自治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规划合理利用了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这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过渡显然不是在无阶级、无国家的抽象的人类世界中展开的,而是面对较自身更占优势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受到了技术强势的民族—国家的霸权主义约束。在当今的全球化中,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存在一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的社会政治—技术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关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霸权概念,但他在论及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时,认为经济不平等产生了社会不平等。这种状态不仅仅只限于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剥削或压制关系,也体现为民族—国家之间的殖民主义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首先提出“霸权”概念,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拓展到意识形态领域,倡导以无产阶级文化对抗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葛兰西之后,列宁在谈及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时,把霸权看作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赋予霸权主义更为广泛的含义。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从霸权主体来看,不仅有单一的民族—国家霸权,还有发达区域或资本主义阵营或联盟的霸权;从霸权内容来看,有军事、贸易、金融、文化意识形态和科技领域的霸权,且它们相互影响。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美国为了维护其技术霸主地位,挑唆其盟友一起以两种方式阻碍中国技术进步:一是传统方式,即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限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二是最新方式,即以国家安全之名对中国科技企业发展给予遏制(隔断中国企业全球范围的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技术霸权主义,结合自身在社会主义过渡中的技术积累基础上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变化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探索技术社会主义的自治道路。从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强调“提高国产化率”“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再到坚持“自信自立”“科技自立自强”“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sup>[19](P19-35)</sup>,为中国谋求技术自治完成了一次辩证的行动—理论话语循环。技术自治实际上是面对技术霸权而必须要争取的技术自主能力,涉及国家对国家的技术主权之争,要求我们为技术而斗争<sup>[21]</sup>。在外部讹诈遏制封锁和极限施压下,“发扬斗争精神”,“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sup>[19](P4)</sup>,这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谋取历史主动的重要经验总结。提升自治的技术社会主义能力,是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组织治理方式,确立和完善举国一致的技术创新发展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自治的技术社会主义绝不是静态的、封闭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创新体系。马克思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建立共同的美好社会奋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突出文明互学互鉴、合作共赢。自治的技术社会主义对世界具有开放性,但强调开放型创新,必然要以技术自治为前提。只有在技术方面拥有强大的自治能力,才能合理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and 市场,才能赢得设置全球性创新议题与国际合作计划的主动权。

### 六、结语

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从以上论述可以对技术问题的哲学思考理出两条路线:一是技术作用的确定性;二是技术的社会关系。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前一路线上,接近于在长期历史中强调技术的优先性,而在后一路线上对技术资本主义给予批判并展望技术积累对共产主义的历史意义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将这两条路线分别展示为分析的技术哲学和批判的技术哲学,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在前一路线上分化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决定论,在后一路线上倾向于社会建构论,从而为



经典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万花筒式的思想定位。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在技术哲学走向综合方面,都倾向于一种资本主义内部以技术民主化为方向的技术政治哲学话语建构。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将两种路线统一起来进行一种技术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建构:以技术作用的确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设置现代化议题,以技术的社会关系调整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议题提供推动力,以便逐步走向一种自治的技术社会主义。

### [参考文献]

- [1] Qian W. Chines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classical readings and contemporary work[M]. Singapore: Springer, 2020:8.
- [2] Don I.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1975-1995[J]. 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Quarterly Electronic Journal, 1995,01(01/02):8-12.
- [3] Irmak E. Stiegler and Marx for a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J]. Transformations, 2009, 29(17):1-8.
- [4] 刘则渊. 马克思和卡普:工程学传统的技术哲学比较[J]. 哲学研究, 2002(2):21-27, 59.
- [5] Bimber B. Three faces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M]// Merrit R S, Leo M(eds.). Does technology drive hist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79-100.
- [6] Heilbroner R. Do machines make history[M]// Merrit R S, Leo M. Does technology drive hist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53-65.
- [7] [德]马丁·海德格尔.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M]. 海德格尔选集. 孙周兴, 选编. 上海: 三联书店, 1996.
- [8] MaCkenzi D. Marx and the machine[J].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984, 25(03):473-502.
- [9] Linch W T, Fuhrman E R. Recovering and expanding the normative: Marx and the new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991, 16(02):233-248.
- [10] Latour B. The prince for machines as well as machinations [M]// Elliot B. Technology and social process. Edinburg: Edinburg University Press, 1988:24.
- [11] Verbeek P P. The struggle for technology: towards a realistic pol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J]. Foundations of Science, 2017, 22(02):301-304.
- [12]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13]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4] Cohen G A.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15] Marcuse H. An essay on liberation[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280.
- [16] Feenberg A. Rad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from Marx to Marcuse and beyond[J]. Radical Philosophy Review, 2009, 12(01/02):199-217.
- [17] Bao M B, Jongerden J, Lemmens P, et al.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and power: postphenomenology, critical theory, and Autonomist Marxism[J].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015, 28(03):449-474.
- [18]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3-25.
- [1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0] 毛泽东. 矛盾论[M]. 中共中央编委会, 编.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325.
- [21] 李三虎. 当代技术哲学具体化转向与技术政治哲学解释学[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19-33.